

“保合太和，乃利贞”新解

——《易传》论社会和平与社会功利的关系

吴根友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易传》提出“保合太和，乃利贞”的光辉哲学命题，揭示了社会和平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要求创造和平的社会环境促进并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易传》哲学还包涵着“以财聚人”的人本主义经济思想，与以追求利润为旨归的资本主义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

关键词:易传；社会和平；经济发展；人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82(2006)02-0053-07

A new interpretation to “(the conditions of) great harmony are preserved in union, and hence advantage, correctness, and firmn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peace and social utility discussed in Yi Zhuan

WU Gen-you

(Cen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Tuan Zhuan* for hexagram *Qian* (the 1st hexagram in the received version of *Zhouyi*) raised a brilliant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of that “(the conditions of) great harmony are preserved in union, and hence advantage, correctness, and firmness”, which revealed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pea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requires to create a peaceful social atmosphere and maintain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hilosophy in *Yi Zhuan* also conceives an economic thought of “uniting people with wealth” based upon humanism, which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capitalist economics aiming at profits.

Key words: *Yi Zhuan*; social peace; economic development; humanism

一般人都更加重视《周易》一书的玄妙哲理，尤其是重视《周易》一书所阐发的万物皆变的思想及我们如何在变的现象中把握不变的法则的哲学智慧。这种认识并没有什么过错。只是这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掩盖了《周易》一书丰富的贵和政治智慧。其实，在《周易》一书中包涵了丰富而又精彩的贵和政治思想。在我看来，《易传》中“保合太和，乃利贞”的哲学命题就是“易哲学”贵和政治智慧的最凝炼的表达。这一哲学命题的基本含义就是：只有创造和谐、和平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人类所获得的各种利益才可能是正当的、有效的、持久的。这是《易传》“太和论”最为光辉的思想！实际上，将《周易》一部书看作是高度重视的著作，在帛书《易传》的《易之义》一篇中就已经有了明确的阐述。该文说：“天地相率，气味相取，阴阳流形，刚柔成□。万物莫不长生而恶死，会心者而以作《易》，和之至也。”（第429页）^[1]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天地相互作用，阴阳二气流行不已，刚柔相互作用而形成万物，万物没有不希望长生而厌恶死亡的，对于天地万物变化及其爱好有深刻领会的人因此而创作出《易》这部书，而《易》这部书所体现的

收稿日期：2005-12-22

作者简介: 吴根友(1963—)，安徽枞阳人。现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哲学学院副院长。代表著作：《中国现代化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曾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专业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就是最高的和谐智慧。由此可以看出,说《周易》一书蕴涵着贵和的政治智慧,并不是我个人的私见。

当今世界是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时代。然而核战争的阴影并没有彻底地消除。如何建立一种社会和平理论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当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向哲学提出的思想挑战。我认为,从中国“易哲学”传统中可以发展一种新的哲学思想,那就是以创造“太和”的社会环境来规定经济发展的正当性,以社会和平为优先正当性的经济发展思想与理论模式,取代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的以经济发展为优先的经济发展理论。

一、“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论政治和平环境与社会功利的关系

《周易》本来是中国上古先民用来预测未定事物的一部占筮之书,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是一部古典的决策学的著作。由于上古时代人们对自然认识的有限性,这部书中也包涵着很多神秘的因素。《易传》则是春秋末到战国中期的杰出士人们对《易经》所作的哲学解释。解释《易经》的众多哲学论文,经过历史的淘汰,剩下了十篇重要的文章,合称之为《易传》。在这些众多的哲学解释中,《乾卦·彖传》中所表达的政治哲学思想特别值得重视,它提出了“保合太和,乃利贞”的光辉思想。“保合太和”,其实就是要求人们通过主观的努力不断保持一种动态的和平的社会环境。只有使社会处于一种动态的和平、和谐状态,人们谋求功利的行为才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人们获得的社会功利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利益。《彖传》在这里所说的“太和”境界,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和谐状态,而是人们在追求和平的思想观念指导下创发出来的。“保合”二字体现了人对和平、和谐的主动追求的意识,因而“易哲学”所倡导的“太和”理想,在本质上是一种“创和”行为。以上便是我对“保合太和,乃利贞”所做的现代诠释。

历史上诸家对此句的解释多有不同。如南宋大哲学家朱熹从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两个层面解释“保合太和”之意,认为此句所讲的“太和”,乃是“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有生之后。此释利贞之义也。”朱熹的意思是说:太和即是自然界的阴阳二气会合之后,在新的境界里产生出动态的平静和谐之气。“各正”,即是讲万物从一开始的时刻所获得的自然禀赋。“保合”,即是讲万物获得自己的生命之后所处的完美状态。而这种状态,其实是用来解释“利贞”的根本精神。

清人刘沅^①亦从天道与人道两个方面讨论了“保合太和”的意思。他认为“乾元者固天之理,而保合太和者乃人所以承天之道。此言人物各得乾道,以成性命。惟各正而后保合也。”(转引,第11页)^[2]

刘沅的意思是:乾元是天本来所拥有的理则,所谓“保合太和”的行为,乃是人继承天道的道理之所在。这些话是说,人与万物都分别从天道那里获得了自己的内在规定性,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内在特征。但只有做到使万物都能恰当地获得自己的规定性,然后才能变谈得上保合太和。

清人李道平在《周易集解纂疏》中对此句的解释有一定的新意。他认为,“‘和’即利也。乾不言利,故称‘太和’。”(潘雨廷点校本第37页)^[3]意思是说,太和本身即一种利益。然而天道公正无私,从不谈论利益问题,所以称之为太和。

清代大哲学家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对“保合太和”一句的解释偏重于人事的努力,强调“保合”对于“太和”的积极作用。他说:“保合之为太和,不保不合则间气乘,而有余、不足起矣。……勉其不足之谓文,裁其有余之谓节。节文著而礼乐行,礼乐行而中和之极建。”(《周易外传》卷一《乾》八,第831页)^[4]这段话的意思是:正因为通过人为的努力与协调才有太和的状态,不去维持不去协调,则天地自然之驳杂之气就会乘虚而入,有余与不足的两种不平衡现象就会产生。人们通过努力补充不足的行为就叫做文饰,人们裁剪多余的东西就叫做节制。节制与文饰的行为彰显出来,礼乐的规范就因此而能在生活中施行,礼乐的规范在生活中能够施行,则中和的理想社会状态就因此而被建立起来了。在王夫之看来,人世间的功利、名位,其实都是太和的德性自然演变出来的结果,所以王夫之又说:“功用者太和必至之德,位者太和必至之化也。”(《周易外传》卷一《乾》八,第831页)^[4]这即是说,社会的功利,是太和的环境必然会产生的一种社会效果,而每个人所拥有的社会位置,是太和的社会环境必然导致的一种社会选

^① 刘沅,清代乾隆时代人,著有《周易恒解》一书。

择的结果。

在《周易内传》中，王夫之更进一步强调了“协于太和”与“贞之利”和“利之贞”的关系。他说：“乾以纯健不息之德，御气化而行乎四时百物，各循其轨道，则虽变化无方，皆以乾道为大正，而品物之性命，各成其物则，不相悖害，而强弱相保，求与相合，以协于太和，是乃贞之所以利，利之无非贞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乾卦完全凭借纯粹刚健生生不息的美德，来统率大化流行，四时变化和百物生长，让他们各自遵循自己的轨迹，因此，虽然万物变化没有定准，但都是依照乾道的至正法则，从而万物都依照自己的内在规定性，各自完成自己的成长，而且互不妨碍互不伤害，相反还可以做到强与弱相互保护，相互之间寻求和作，从而与太和的理想境界相协调，这便是正道之所以能产生利益，而各自的利益无一不是正道的深奥道理。很显然，王夫之依托天道的变化来阐述人世间的社会正义与社会功利之间的和谐关系。正义的社会环境对于人们都会带来利益，而每个人都能以正当的方式获得利益的行为本身就是社会正义的体现。

在王夫之看来，人世间的高明统治者就应当像圣人学习。因为圣人能够效法天道的法则，使万物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各得其宜，从而以一种和谐的方式共生共荣。如王夫之说：“自诚而明者，察事物之所宜，一几甫动，终始不爽，自稚迄老，随时各当，变而不失其正，益万物而物不知，与天之并育并行，成两间之大用，而无非太和之天钧所运者，同一利贞也。”（第52—53页）^[4]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所谓的从诚开始而达到明德境界的圣人，就是要深察事物的各自的适宜境遇，当任何事物出现之后，直到结束都没有差错，从幼稚状态到衰老的结局，随时都能适当无偏，万物皆处于变化之流而不丧失它们的应得之利，使万物有所获益而万物并不自知，参与天地生育、培养万物的活动之中，而辅助天地完成天地间万物成长的最大功利，圣人一切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像太和的天然轮子运行的那样，使万物各自获得自身的正当利益。

从以上所引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国古代哲人对“保合太和，乃利贞”的解释，偏重于以天道的变化为榜样而论述人类追求利益的行为。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作这样的理解：政治行为就是要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从而确保人类追求利益的正当性、可持续性的。而生在明末清初社会大动荡时代的王夫之，目睹了政治局面混乱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在阐述《易传》这一哲学命题时，能够发掘出比前人更深更多的哲学思考，重视人类自觉的“保合”行为对于“太和”环境的产生与保持的积极意义。王夫之的这种思考对于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重新思考世界和平对于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具有极强的启发意义。在继承王夫之的哲学思考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对《易传》所说的这一光辉命题——“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给出更新的阐述。我们认为，这一段的深层意义是：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恰当位置，社会就会出现真正的和谐局面，人类社会的所有利益才具有正当性，可持续性。

《易传》的作者常常以称赞天为假托，实际上是歌颂理想中的王者。“天”作为万物之首，以其无私的，和谐的方式运行，故能使万国都能安宁，这便是“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王道理想。在《文言》传里，作者歌颂“天”对万物生长提供便利而不求自利的无私公正品格：“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乾、元”，即是万物之开端，他创始万物而又使他们健康成长。“利、贞”，即是天所包涵的内在的本质与实情。天一开始就能用美好的利益来使天下万物获利，却又不说出他所施予的利益，这是伟大的利惠啊！伟大的天啊，刚强劲健，居中守正，通体无杂，纯粹至精。乾卦的六爻运动变化，曲尽万物的发展情理，犹如顺着自然时节驾驭着六条巨龙而运动不已，行云降雨，带来天下太平。^①

^① 译文参考了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

二、“何以聚人？曰财。”——《易传》经济哲学的人本主义内含

在《系辞》下传,《周易》的作者对执政者提出了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其一是“何以守位”?其二是“何以聚人?”对此两个问题,《易传》作者的回答是:通过财去聚人,通过仁德去守位。这样,《周易》的政治哲学思想就具有鲜明的古典人本主义特质。它暗含着这样的光辉思想: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就应当直接地指向对人的凝聚,而不是指向对纯粹利润的追逐。这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以追求直接的经济利润为目标的经济思想非常不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质,由于彻底改变了生产的性质,使得整个社会经济行为从根本上带有极强的功利色彩。由于在竞争中必然地要追求高额利润和经济指标,最终会导致对人的价值的贬抑。而产生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易哲学思想,则具有古典的人本主义内涵。所以,中国古代的易学研究者崔觐^①在解释“何以聚人?曰财”这一句话时说:“货财,人所贪爱,必见利不亏其义。若不以义理之,则财必败。”(潘雨廷点校本第602页)^[3]这段话的意思是:财货是每个人都喜欢的东西,但人们在财货面前不能做有损于道德原则的事情。如果通过不道德的手段去谋取财货,则其所获得的财货最终一定会丧失的。这就说明了经济活动必先以道德的正当性为基础,方才能保证其可持续性的道理。

民族国家之间争夺经济发展的资源,是导致20世纪初期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战争的性质。冷战时代后的核威慑使得全球性的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以技术为前导,以人才竞争为表相的世界范围的资源掠夺进程更加迅猛。后工业社会的所谓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更加剧了这种竞争的程度。因此,在经济发展与人性关怀的问题上,究竟以何者为目的,就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何以聚人?曰财。”这句话的直译是:凭什么来团结人?回答说:财富。乍一看,财富非常重要。没有财富就无法团结人。其实,从深层的语义分析来看,财富是用来干什么的?不就是用来团结人,联结人的吗?因此,聚人是运用财富的目的,而财富仅只是聚人的手段。当财富匮乏时,我们要团结人,就必须创造大量的财富。但切记,财富仅是聚人的手段,不能将聚集财富看作是目的。财富的最终价值要体现在团结人的目标上。所以,传统儒家的“义利之辩”,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求执政者在社会原则的正当性与社会财富的获取这二者之间,要以社会原则的正当性放在优先的地位,利益的目标放在其次的位置。正如《大学》所说的那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当统治者具备了政治美德才有人民,有了人民才有领土,有了领土才有财货,有了财货才有各种社会的功用。政治美德是社会统治的根本,财货是次要的东西,如果拒斥根本而接纳末节,则将使人民相互争夺。所以统治者聚集了财货而人民就散离四方,统治者的财货之利分散到社会之中人民就团聚在一起。所以用不正当的方式发布政令,这些政令也将会以遭到社会蔑视的方式而回馈给发布命令的人,不用正当的方式获得的财货也将以不合理的方式而被消耗殆尽。

当然,我们可以批评传统儒家所要维护的社会正义原则本身可能有问题,因为他们的社会正义是以等级制为前提的。但要求国家与执政者重视社会正义的优先性,尤其是要求国家和他的官员们不要与普通民众争利,这一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则是完全正确的。只有以社会正义为前提,社会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

其实,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非人道性特征,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起就受到了来自其社会内部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批评。十八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均以极大的道德热情批评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非人化本质,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尽管这些社会理想或多或少地都带有政治乌托邦的性质,但其所具有的现代人道精神则是基本一致的。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理想比起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更具有社会科学的实践性品格。但是,由于时

^① 崔觐,南北朝时人,曾对《周易》一书作过注释,今已散佚。

代问题意识的障碍与遮掩,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并没有将社会和谐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正当性前提和可持续性的保证。相反,在阶级对立的简约化与明朗化的初期,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种社会革命论,号召被压迫的阶级用武力的形式起来反抗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从而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在20世纪初期与中期,形成了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斗争理论的指导下,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工人斗争也迫使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来调整自己的各项经济政策,使资本主义国家由早期贪婪地追求利润型的“经济动物”逐渐地向福利社会过渡。但是,资本主义本身的贪婪性质并没有因此而被改造,而是以另一种转嫁的方式向后发达国家与地区转嫁,从而引发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矛盾。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本身的非人化本质,而只是改变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非人化形式。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恶化,人与社会关系的恶化,人自身身心问题的恶化就是其最突出的表现。地球越来越不可居住,人越来越离群索居,个人的身心分离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非人化本质的集中表现。

因此,重新强调、并提倡现代经济发展的人本主义理想,是社会发展和人性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也是对一切古典的理想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精髓的最合理地继承、发扬与光大。

“易哲学”传统一再强调人在经济发展过程的优先性问题,反对直接地以功利为目标的经济活动。因此,“易哲学”传统特别强调经济活动目的的合理性问题,将经济活动的本质意义规定为“何以聚人”的社会团结问题,而不是直接的利润指标问题。这里面包涵着深刻的古典人本主义精神。这一思想,在道家的创始人老子那里,也有类似的表达。老子以一个智者的口吻说道:“名誉与生命哪个与人更亲近?生命与货物相比哪样更值得重视?获得与失去哪样更能产生危害?所以,过分地爱惜一定会招致更大的破费,过多的贮藏一定会招致更多的丧失。知道何者为满足就不会招致侮辱,知道止于何处就没有危险,可以使国家政权长久。”^①

老子还直接地指责当时的统治者,正是因为他们不断地聚敛财富,才导致了天下苍生不如死的悲惨状态。他说:“人民之所以饥荒,是因为在上的统治者收税太多,所以出现饥荒。人民之所以难以统治,是因为在上的统治者太惹事生非了,所以难以统治。人民之所以轻视死亡,是因为在上的统治者太过于重视自己的生命了,所以轻视死亡。”^②因此,他将这种以聚敛财富为目的,将朝廷建筑修得很美,统治集团的人们身上穿得非常地华丽,而根本不关心万民忧乐的浮华经济现象称之为“盗夸”(即虚华的意思)。如老子说:“朝廷很整洁,田野很荒无人,仓库很空虚。统治者穿得很漂亮,佩带着利剑,满足于酒色之中,自己的财货非常充足。这是一种浮华的社会现象,不是一个有道的社会现象。”^③

以上是从社会的整体目标而言,易哲学表达了经济发展要以人的团结为目的的古典人本主义经济思想。即使从个人的生活角度说,易哲学也提出了以人性全面的发展为目的的人生哲学。

从个人求利与自身人格发展的角度说,《易传》也反对一些人为了财货而不顾自家性命的做法,要求人们做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系辞》下)。意思是说,人们追求利益主要为了使生命安全,并因之而使自己的德性得以提升。《易传》作者将那种不顾仁义廉耻而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的人称之为“小人”,并引孔子的话批评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孔子说,小人不以自己没有仁德而感到可耻,不敬畏不义的行为,不是看到有利可图而不去努力,不受到威胁就不知道警戒。”^④《易传》作者的这一思想,在后来儒家的思想家那里又有更为简洁明确的说法,将这些人的行为称之为“以身发财”。如先秦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篇,特别反对人们“以身发财”——即通过消耗生命、甚至不顾生命安危的做法去赚取钱财,而

① 老子第四十四章原文:“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② 《老子》第七十五章原文:“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③ 《老子》第五十三章原文:“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綵,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④ 《系辞》(下)原文:“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

主张人们要“以财发身”——即要用财富使人的生命需求的多样性得到全面的发展。^①

“何以聚人”一语有他的历史性内涵与超历史的深刻的人本主义内涵。从历史的角度说，“何以聚人”就是如何团结更多的人口，使一个国家人多士众，从而具备发展经济的巨大潜力。这是上古时代地广人稀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当今社会，易哲学传统中的“何以聚人”命题，完全可以发展出更为深刻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不只具有表面意义上的人才竞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调动整个社会的人心问题，使民众归附于一种理想的制度与社会状态。也正是从这一角度说，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提出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理想，仍然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诱惑力。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第294页）^[5]。个人价值与社会的价值同时得到重视，而又以每个实在的个人的价值为理论起点上的优先性的。在这一点上，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与自由主义的社会理想有殊途同归之妙，而比起自由主义对人的要求内涵而言又更加丰富。自由主义是一个低度的要求，即以保证每个人的基本自由作为一个理想社会的底线，而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则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肯定了个人的自由，还肯定了每个人在获得自由之后的全面发展问题。

三、创造和平的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正当性和可持续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保合太和，乃利贞”命题的现代启迪意义

在以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为主导的现代时代，国际社会和平往往变成了某种道义上的口号。人类自从进入20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伴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全球化的生态破坏，地区冲突的加剧，迫使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特别是后现代化国家的环境破坏的加剧，更促使人们认真思考经济发展的正当性与可持续性问题。要解决现实的问题，往往需要我们从古老的智慧中汲取力量。我们认为，《易传》哲学中的“保合太和，乃利贞”的光辉命题，已经先在地提示了人们：创造和谐、和平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正当性与可持续性的前提。没有和谐、和平的社会环境，经济活动的正当性就应当受到质疑，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也将遭到怀疑。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从农时的角度强调人顺应自然，按照节令来从事经济活动。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除了要遵循这一基本规律之外，还有更为复杂的内含。那就是：一方面要遵循自然的规律，另一方面还要遵循人性的内在要求，使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起来。只有这样，经济发展才具有了道义上的正当性，在发展潜力方面才可以是持续的。

“保合太和，乃利贞”问题后来转化为“义利、王霸之辩”，和谐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正当性和可持续性问题，被转化成伦理学上的“义利之辩”，政治哲学上的“王霸之辩”，换句话说，变成了一种经济伦理与政治伦理问题。这是思想的发展与深化的表现。“义利之辩”，即是讨论经济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要求的经济伦理问题。传统的中国人，特别是儒家的思想者，尤其重视以合乎道德要求的方式去追求经营者的利润，反对违背道德要求的谋利行为。这是义利之辩的实质性内容。“王霸之辩”则是讨论政治权力使用方式的合法性问题。一个具有强大政治权力的统治者，如果采用暴力的方式统治人民，处理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就是“霸道”；如果是通过仁道的方式获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而其他民族则心甘情愿地与他和平相处，这便是“王道”。而王道政治的内容之一，就是要使天下人都能获得利益。如《系辞》（下）说：在包牺氏之后，神农氏接管了统治天下的权力，砍伐树木教人们制作各种从事农业生产的工具。“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所以，中国古代政治理想中的“王道”，就是天下的人都愿意归往的一种和谐、仁慈、自由的政治之道。正如战国时代的孟子规劝齐宣王时所说的那样：“现在王如果能改革政治，施行仁德，便会使天下的士大夫都想到齐国来做官，庄稼汉都想到齐国来种地，行

^① 《大学》原文：“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朱熹注释道：“发，犹起也。仁者散财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货殖。”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

商坐贾都到齐国来做生意,来往的旅客也都想取道齐国,各国痛恨本国君主的人们也都想到您这里来控拆。果然能做到这样,又有谁能抵挡得住呢?”^①

其实,在《周易》的经与传的内容中,还有一些重视和谐的文字,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泰卦》了。泰卦的卦象是坤居上位而乾处下位,象征着刚强者谦虚处下而让柔弱者处上,从而形成安泰的局面。《周易·彖传》解释泰卦时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意思是说,天地阴阳交合,万物生长通畅,君臣上下合衷共济,整个社会有一种共同的理想。因此,在这样的局面下,“君子之道日渐增长,而小人之道日渐消亡。”^②一个和谐的社会局面就会到来。在这样的理想社会里,天下国家之间具有一种正常的贸易往来,交易按照公平的原则进行,所以人人各得其所,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这种极致的和谐社会状态其实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种反映,从而保证了人类的经济能够长久、持续地发展。

结 语

《易传》所阐发的社会和平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可以启发我们对以下几个相关层次的问题作进一步地思考:第一,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通过和平的经济交往模式,发展全球的经济,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获取各民族自身的利益。第二,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就是生态伦理与环境伦理所关注的问题。第三,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增进人的幸福为旨归,而不是以利润的上升为鹄的经济发展模式。第四,人自身的身心和谐,即在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使人的身心问题达到和谐,不要使人的内心产生巨大的波动经济模式。要而言之,唯有“保合太和”,人类的所有功利行为才能是下正当合理的,也才能发挥正面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A].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2]马振彪.周易学说[M].张善文整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
- [3]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M].潘雨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
- [4]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林忠军

^① 《孟子·梁·惠王》(上)原文:“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译文采用了杨伯峻先生的翻译。见《孟子译注》第21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② 《周易·彖传》原文:“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